

湖湘

杨昌济 著 王兴国 编注

杨昌济集

①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教育出版社

文库

杨昌济 著 王兴国 编注

杨昌济集

①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教育出版社



湖湘文库
甲编

C52
Y152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问	张春贤	周 强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戚和平	谢康生	文选德
	孙载夫				
组 长	蒋建国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凌沙	姜儒振	吴志宪	李友志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金则恭	朱有志	刘献华
	钟志华	刘湘溶	彭国甫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李凌沙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曾鹏飞	毛良才	刘国瑛
	陈壮军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朱汉民	曾主陶
委 员	李建国	丁双平	汪 华	刘清华
	彭兆平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谢冠军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
规划项目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或据原本影印两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杨昌济像（1912年）

前言

杨昌济，辈名宏棻，字怀中，号华生，册名昌济。1871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今开慧乡开慧村）下屋杨家。杨家原居长沙县金井的蒲塘，18世纪末，在杨昌济高祖父时迁移至此，并逐渐成了一户耕读之家。其祖父杨万英为“邑庠生”（秀才）和父亲杨书祥为“例贡生”（秀才），都长期在家乡当塾师。杨氏在14岁以前，一直在父亲指导下进行学习。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儒家经典、宋明理学和曾国藩著作。1884年，父亲逝世之后，他继续求师问道，并认真进行自学，于1889年考上“郡庠生”（秀才）。在此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不得不一边教私塾，一边准备举业，并参加过几次“乡试”，想考上举人，但都未能如愿。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及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失败，使杨昌济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他开始看到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罪恶用心，看到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因而激发了满腔的爱国热忱，认识到“非改革不足以图存”^①。所以，当1898年戊戌

^① 见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

变法开始以后，他便投身于湖南的革新运动。当时，正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杨昌济，不顾书院山长王先谦对于变法所采取的保守态度，积极参加了谭嗣同等人组织的南学会和不缠足会，并经常出席南学会举办的讲演会。他按照南学会出题所写的《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一文，被该会评为第三名，并刊载在《湘报》上。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杨氏的变法主张。文章分析了中国工农业落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外国资本家在我国廉价倾销产品，造成本国工农业产品“销售滞而价值微”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在于国内政治落后，“士大夫惟务防弊而不务兴利”，对民族工商业采取歧视、排斥政策。因此，他认为：“西人之立国也以商，其困我也亦以商，我而不大兴商学以与之力争，将何以立于强大之间乎？……而商务之本源，尤在于农工之学，其必先振兴夫二者，而后商务可得而言也。”^①为此，他提出了发展农工之学的一系列设想和措施。

在变法过程中，杨昌济结识了谭嗣同。他对谭氏提出的一系列改良主义主张热烈拥护；对谭氏敢于“冲决网罗”的大无畏献身精神，十分敬佩；对谭氏的“以民为主”的民主思想和“仁以通为第一义”的哲学思想，衷心服膺。通过杨氏这一个时期的日记可以看到，他在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人的影响下，曾认真研读改良派的理论武器——今文经学，特别是《公羊春秋传》。他还阅读了谭嗣同特别推崇的王船山的一些著作，并仔细阅读了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

戊戌变法的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的被戮，给杨昌济以深刻的刺激。一方面，使他对改革者们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十分敬

^① 见杨昌济《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

仰，认为“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①；另一方面，使他从这次失败中总结教训，认识到光靠上层统治者进行自上而下的变法图强，是难以成功的。他在19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明确表示：“法之变有二：有变之自上者，有变之自下者。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②而要“变之自下”，就必须依靠“小民”的力量，使“民智大开”。怎样才能开民智呢？他认为必用“世界之知识”以“指导社会”^③，即向先进的西方国家学习。于是，在1903年春天，他便离乡背井，踏上向西方学习的征途，出国留学。

1903年4月，杨昌济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科。入学不久，留日学生掀起拒俄运动，以抗议帝俄永久霸占我国东三省的企图。杨氏参加了其中的一些抗议集会，但是当留日学生组织“拒俄义勇军”时，他以自己“志在求学”、“非破坏才”为由，没有参加。第二年，杨昌济因嫌弘文学院速成科太简浅，转入普通科学学习。普通科学制3年，主要是学习日本语言文字及中小学课程。这种转科学习，的确反映了他的“志在求学”的态度。1906年，杨氏经过3年学习，从弘文学院毕业。由于他品学兼优，得到了校长嘉纳治五郎的赏识，所以毕业后便升入也是嘉纳主持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修业期限为4年。

1908年，杨昌济的好友杨毓麟充任清政府欧洲留学生监督蒯光典的秘书，与蒯同行的还有章士钊。杨、章向蒯介绍了杨昌济的人品和学问，于是蒯光典便调他赴欧洲留学。杨昌济于1909年农历三月来到英国，并进入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学习。为什么杨

① 见杨昌济《论语类钞》。

② 见杨昌济《达化斋日记》。

③ 见杨昌济《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

昌济要放弃在日本的学习而来到英国读书呢？这是与当时的政治和学术背景分不开的。原来，在20世纪初，中国的士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认为日本向西方学习取得了成功，日本又与中国“同文同种”，学习语言文字也比较容易；加之中国到日本距离又较近，旅途经费也较节省，于是那些有志向西方学习的中国青年士人便纷纷到日本留学。但是，通过日本而向西方学习，毕竟是第二手的東西。杨昌济经过在日本的5年多的学习，对此是有深刻体会的。所以当蒯光典调他去英国学习时，他是欣然接受的。事实也证明，杨昌济的这一选择是正确的。据张明女士的研究，阿伯丁大学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教育也是最先进的。这里，不仅有先进的教学方法，即该校于1902年以“讨论课和启发式教学”取代了有260年历史的老的苏格兰式的做报告记笔记的教学方式，而且有一批在学术上处于世界最前沿的教授。杨昌济在此接受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了解了世界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他不仅在学校认真学习，而且还利用一些机会，深入英国的中小学进行教育考察。他在1912年上半年从阿伯丁大学毕业时，获得了文科学士学位。接着，他又到德国考察教育9个月，于1913年春回到阔别了10年的祖国。

杨昌济回国后的前5年，是在湖南工作的。这是因为，当年他出国留学经费是由湖南省资助的，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学成之后必须回省工作5年，才能到外省工作。当他回到湖南之后，政局并不安宁，“二次革命”的失败，使他更加感到失望。所以当谭延闿邀请他出任湖南教育司司长时，他坚辞不就。他怀着“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的高尚理想，愿作一位为祖国培养“大木”的辛勤园丁。因此，从1913年到1918年，他先后或

同时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和第一中学任教，分别讲授哲学、伦理学（修身）、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在此期间，他关心政治，积极营救过因“二次革命”失败而被汤芑铭逮捕并杀害的革命党人杨德邻，反对袁世凯独裁称帝的种种阴谋活动，抗议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满怀热情地投身于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理论上，他继续深入钻研中外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学，撰写了大量论文和讲义，翻译了许多外文著作。

杨昌济由于思想进步，道德高尚，知识渊博，所以在每个学校讲课，都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许多学生不仅在课堂上专心听他讲课，而且在课余成群结队前往他的“板仓杨”寓求教。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陈章甫、罗学瓚、张昆弟等，更是他家的常客。杨先生诲人不倦，他不仅热情地向这群青年学子介绍和传播西方各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介绍和传播了大量中国古典学术思想和历史知识，还和他们一道严肃地讨论当前的时事政治，鼓励他们要努力向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风，炼就一副强健的体魄。在杨昌济的循循诱导下，这群青年不断进步，并且经常围绕“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生活向上”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这种讨论的结果，便导致了我国“五四”时期最早的社团之一——新民学会的成立。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谈到学会缘起时，曾着重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新民学会成立时的21个“基本会员”，除罗章龙是第一联合中学的学生以外，其余20人都是或曾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都曾或长或短地“与闻”过杨昌济的“绪论”。罗章龙在

响应“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征友启事”并与毛泽东建立联系后，也经常去杨昌济家“与闻”其“绪论”。学会确定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及有关纪律，与杨昌济的一贯主张也是相吻合的。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杨昌济是早期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

1918年夏天，一方面由于杨昌济已经兑现了服务本省5年时间的约定，另一方面则由于北洋军阀任命的湖南督军张敬尧的反动统治，使教育受到极大的摧残，于是他应蔡元培之约，离开湖南赴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哲学系的伦理学和伦理学史课程。杨昌济在北京期间，正值“五四运动”进入高潮。他很关心新文化运动，曾与胡适等人一道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并应许德珩等人之约，给《国民》杂志撰写了《告学生》一文。文章号召广大学生担负“唤起国民之自觉”的重任，“力伸公理而不屈权势”，“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能行人之所不敢行”。杨昌济人虽在北京，但仍然十分关心在湖南新民学会的活动，特别是积极支持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他曾协助蔡和森等人筹措赴法旅费，使他们得以按时成行。他又介绍陪同湖南赴法学生进京的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使之得以在李大钊直接指引下，“开始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①

1919年下半年，杨昌济因身体不好，一直在北京西山疗养。入冬以后，病势转重，先是胃病，继转浮肿，12月初住进北京德国医院。他当时并未感到自己病势的危重，而是认为人生百年，今后的50年还可以在学术上大有作为，并且计划5年后举家迁往巴黎，继续研究世界最先进学术思想。可是天不假年，杨昌济在

^① 毛泽东语，引自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1920年1月17日就以未满49岁的年龄，离开了人世。一代哲人，就这样匆匆走过了他短暂的人生道路。

二

本集共分4个部分，即杨昌济的论著、日记、译著3个部分，再加上附录部分。

第一部分，为杨昌济的论著。其中包括：日记摘抄3篇（即两篇《达化斋日记》和《静观室札记》），这些日记之所以放在论著一类，是因为它们都是以论文形式发表或整理的，而不是按日记的年月顺序形式出现的；专著3种（《论语类钞》、《教育学讲义》、《心理学讲义》）；信1封《致教育总长范源濂书》；其他论文19篇。这些论著大部分曾收入1983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杨昌济文集》。其中的文稿在这次收入本集时，编者又根据原版书籍或原发表刊物进行了校订，改正了个别差错。论著部分这次较“文集”新增加的文稿有6种，即《讲堂训谕》《心理学讲义》《心理学讲义附录一》《黄宜人传》《宗教论》和《改良家族制度札记》，它们都是根据原刊印族谱、书籍或刊物整理的。论著部分的排序是论文在前，著作在后，并按照写作或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的。社会上曾流传说，杨昌济还有《达化斋读书录》，陈漱渝先生认为其实就是《达化斋日记》中的读书记录（参见本书附录），编者同意这一看法。还有一种说法，杨氏著有《修身讲义》（见《蒲塘杨氏族谱》有关杨昌济的记录），据本集编者的研究，其实这不是一本著作的专名，而是杨氏有关修身的多种讲义的总称。例如，在《达化斋日记》中谈到修身讲义时，既有《达化斋日记》，又有吕新吾《呻吟语》等。当1914年《论语类钞》出版时，《湖南教

育杂志》在为此书做广告时，写得就是“修身讲义”。

第二部分，为杨昌济的日记。杨开智先生生前曾对本集编者说过，他在父亲杨昌济先生逝世之后，曾将其大量日记、书信和著作，交给李石岑先生。李先生当时正在上海主编《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便将杨昌济的日记从1920年12月至1921年6月在该副刊连续刊载了半年多的时间。后来，李先生离开了《时事新报》，这些日记便没有继续发表了。由于李先生英年早逝，这些未发表的日记和书信均散佚了。现在本集收入的杨昌济日记，就是《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发表的全部内容。197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达化斋日记》，是根据一个手抄本进行整理的，没有查对《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的原文，因此不仅漏抄的日记未能补上，而且在文字上和时间的排列上都存在不少的错误。1980年编者正从事杨昌济研究，要到上海、北京等地进行调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达化斋日记》的责任编辑徐日晖先生，便委托我对《达化斋日记》进行校对。我不仅请老同学阎长贵同志在北京找到了一些《时事新报·学灯》副刊进行了校对，而且自己在上海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发表《达化斋日记》的全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又据此进行了校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达化斋日记》“校订本”就是这次校订的结果。那次校订的情况，在当时出版“校订本”的《再版说明》中一一作了交代。在收入本集时，编者又对杨昌济在日记中引用的一些著作，只要能够找到原书或原刊的，又一一进行了校订，改正了一些差错。

第三部分，为杨昌济的译著。其中译文16篇，有14篇是《教育学讲义》附录，2篇是在当时的刊物上发表的。专著2种，即《西洋伦理学史》和《伦理学之根本问题》。它们都是由北京大

学出版部出版的。这部分的排列次序，也是论文在前，著作在后。《西洋伦理学史》是杨昌济于1916年翻译的，不久青年毛泽东将其原译稿借来，整整抄了7大本，不仅自己认真阅读，而且在同学们中进行传阅。

第四部分，为附录。共收集有关杨昌济的生平、逝世之后追悼活动及回忆的资料40件，其中既有家谱、日记、新闻、报告、启事等原始文献，而且有许多悼念诗文、挽联、回忆录和研究文章。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杨昌济的生平和思想都是重要的参考文献。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杨昌济逝世之后，其侄儿杨开明烈士曾将各方面人士的挽词绝大部分都抄录下来了，这次由伏家芬先生提供出来，第一次公开发表。这既为研究杨昌济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也是对于烈士的一种纪念。张明女士在英国读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东西方之旅：杨昌济及其思想》，是专门研究杨昌济的，这次征得张女士的同意，翻译了杨氏在阿伯丁大学学习情况的一节，收入本集附录，这对于我们了解杨氏在英国学习情况也是很有助益的。

9

有关本集的编辑，尚须说明如下：

一、在编选本集时，我们做了广泛的搜集工作，但因时间久远，恐有遗漏，如广大同仁与读者有新的发现，祈拨冗相告为谢。

二、编者对收入本集的文稿大都加了题注，以说明其出处或来源；对文稿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和少量字词也进行了简要注释，为阅读之便，有重复注释的情况。

三、杨昌济先生所处的时代，是我国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时期，其所写所译均采浅近文言，文字、词语、语法与现代汉语有所不同，为保持原貌，以供现代语言学者研究之用，在校订过程中除对原版书中的某些错、讹、衍的文字用〈〉□符号加以

标明外，悉依原版书用简化字排制。例如有关年月日、数字的写法以及“渺小”、“豫备”、“刺戟”、“起原”、“根原”、“计画”、“驯至”等等字词均未作改动。缺字或字迹不清楚者则用□表示。由于原文是竖排的，有关“如下”、“如上”的表述，都是“如左”、“如右”，今仍其旧。

编者在编辑本集时，曾得到学术界和社会上许多单位和朋友的帮助，恕未能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三

杨昌济是我国近代一位积极向西方学习的知名伦理学家和教育学家。本集虽未能收集其全部著作，但就以其现存成果而论，亦可以看出他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贡献。下面，我们拟从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和湖湘文化史两个方面分析其主要贡献。

首先，看其对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贡献。这又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杨昌济最早全面而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的伦理、哲学、教育和心理学说。

早在1903年赴日本留学途中，杨昌济就曾经与同行者约定：“在东京除上讲堂外，以译书为私课，随译随印，以饷同胞。”^①他这一愿望虽然在留学期间未能实现，但是在归国之后，则是在积极兑现的。他在长沙教书时，为了教学的需要，先后编写了《教育学讲义》和《心理学讲义》，并且撰写和翻译了许多材料作

^① 见朱德裳《癸卯日记》。